

# 李東華

楊宗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## 一、李東華教授生平簡述

李東華（1951-2010）教授，祖籍河南嵩縣，1951年生於臺灣臺東，其父李福生教授，長年執教於臺南師專，作育英才無數，先生家學淵源，幼承庭訓，早歲即嗜讀文史，立志致身研究教學。1968年考進政治大學歷史學系，就學期間，得方豪（杰人）院長、徐玉虎教授之啟迪引領，涉獵域外史地。嗣後在臺大歷史學研究所攻讀時，仍師事方豪教授專治中外交通史，陸續完成〈唐宋元時代中國與東非之關係〉（1974），及〈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：九世紀末——十五世紀初〉（1981）之碩、博士論文。1982年起留校任教臺大歷史學系，歷任講師（1982-83）、副教授（1983-1990）及教授（1990-2007）。在此期間，先獲傅爾布萊特獎助金，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研究（1986-87），從劉子健教授，鑽研宋史，後在包樂史（Leonard Blussé）教授邀請下，赴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研究（1993-94），蒐羅南洋史料；並先後兼任天主教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（2007-08為客座講座教授）、暨南國際大學、臺北大學等多校歷史系、所課程。1997年出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（兼所長）兩年；1999年獲選為臺大文學院院長，在職三年（1999-2002）。2007年合聘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。同年自臺大退休，轉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

先生治學甚勤，著述不輟，先後出版《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：古代篇》（1990）等專書八種（另有《臺大校史研究》、《方杰人師學術貢獻之研究》兩本專著已結集成書，等待出版），及論文近百篇。

## 二、李東華教授的學術成就

細數李東華教授的治學歷程，大致可分三階段：初期是延續碩、博士論文的思考脈絡，致力於唐宋元時期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，尤以泉州港史的研究知名；中期則關注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，其中以對方豪教授的相關研究成績最著；後期則在臺大校史的研究上異軍突起、綻放異彩，發表了多篇質量俱佳的論文。以下謹就此三階段分述之。

### （一）關於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相關研究

這是先生的本業領域，也是用力最鉅的研究方向，早在大陸《海交史研究》期刊創刊（1978）前，先生即對中古、近世時期的泉州著手研究，可算是「泉州學」研究的先驅。

先生的海洋史研究，發表著論甚多，主題前後相屬，自成系統，依時序從秦漢變局下的南越國、吳大帝孫權的交廣分治、六朝交趾的土變、五代分立政權（南漢、吳越、閩）據海稱雄的榮景，迄媽祖信仰的興起、

馬可波羅筆下的泉州等，均有涉及，對中國古代海洋發展史作了全局的撮要與架構的初建。

先生常慨嘆中國古代海洋史的史料稀缺、零散，解讀又格外費神，是吃力不討好的研究，但先生卻經年的埋首其中，積久漸深的勾稽發覆、玩味有得，研究子題涵括：古籍中海外地名的考訂、歷代海洋政策的轉向及其得失檢討、航線航路的轉變（從最早《漢書·地理志》載的漢使航線到澎湖在海上針路的被發現）、中韓關係、進出口貨物的品項、〈市舶條例〉等範疇，其一貫的論述在於打破中國傳統內陸帝國的印象，尋繹各朝代的海向性格，及基層人民勇於出海殖利的過程。在研究課題上，先生接續了馮承鈞、張星烺、向達及方豪教授等民初學人的步伐，承繼了日本學者藤田豐八、桑原鷺藏二氏的研究遺緒，加以擴大面向和深化成果，得有超邁前人的成績。

其中先生對國史上福建地區海外發展的研究，尤為精闢，此與美籍學者 Hugh Roberts Clark 的研究相輝映，蔚為雙璧。先生認為，泉州海貿的騰飛是其來有自，在唐五代即有海上淵源，北宋末設市舶迎來發展的契機，南宋大盛超越廣州，元時獨盛，入明後漸趨消沈；泉州的興盛在於能兼攝東北亞與南洋航路，與福建地區的整體開發同步進展，因而得有廣大腹地、物產、手工業成品及累積的航海知識作支撐；此外，福建聯外交通的改善、中國政經重心的南移、朝廷

獎掖等皆有以致之，先生對此剖析甚詳。

由於先生對中國古代海洋史的若干環節（如造船技術的演進、市舶收入的更迭、海禁之因由等）做了全面通盤的掌握，並據此衍申，曾多次講授「海洋中國史」（跳脫傳統中原王朝的本位主義、正統觀點），「中外關係史」（海路兼及陸路交通）等課程，均獲學子好評。

先生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，得力於紮實的學院訓練，其掌握史料、詮釋史實的功夫道地，而兩度赴國外研究的機會，幫助亦大。先是在普林斯頓時，接觸及利用大陸學界關於海洋考古發掘的新成果，如泉州灣宋代海船的發掘（1974）；在萊頓大學時，則訪求域外史料，孕育了日後研究《華人美色甘條例》的機遇。

先生曾在《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》（共十一輯，中研院人社中心出版）刊登過六篇論著，長期活躍於此一研究圈，其遺願是將歷年研究成果彙整，完成《中國海洋發展史》（古代篇）的專書寫作，為自己畢生的研究作一總結，然未能如願。

## （二）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相關研究

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，泰半集中於探討其恩師方豪教授的學術歷程，除編定《方豪先生年譜》、《方豪晚年論文輯》兩本專書外，（註1）另有專著多篇成一系列。

先生親侍方豪教授十餘年，1968年先

生入讀政大歷史系，次年方豪教授由臺大借調政大，擔任文理學院院長，並在歷史系開課，兩人即結下師生之緣。1972年先生考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，再從學方豪教授，迄博士論文完成的前一年（1980），方教授驟逝，然師徒之情長存，孺慕之思無已。

方豪教授學殖深厚，是中國現代史學重鎮，在中西交通史、宋史、臺灣史的研究上，皆有特出的貢獻，為研究中國現代史學史者所必究，且在這三個研究領域中，培育了不少後起之秀。先生受業門下，從習師友，得以傳承師學，在三個相近領域：中國海洋發展史、五代史，及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上，分別交出成績，「承先啟後」，這應當是對方豪教授最有意義的紀念，也是對「新會學案」（即陳垣，方豪曾師從陳援菴）學風一脈相傳的具體發揚。

為更加瞭解方豪教授的學思歷程，先生曾多方搜求及整理方教授的相關文件：如循方豪教授足跡至其杭州故里及浙大、上海復旦、重慶、京津等寓居地，蒐集相關資料；接受方教授表妹方雲霞女士（方教授在臺唯一親人）提供的方教授私人的資料，包括方豪日記、文稿及與友人來往函牘等（這批資料，在李教授辭世後，已轉由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收藏，冀望能得到更好的保存環境與學術利用）。先生擇要的妥為細究、詳加疏解，方得做出論據更完整、理緒更周密的研究。

先生研究方豪教授，從其生平經歷、交遊網絡、留存書稿著手，置重點於方豪教授的史學研究及貢獻，再逐步擴及到學術以外的傳教志業（如〈方豪神父與民國天主教會〉），（註2）和其在外交上因緣際會下促成的插曲（如〈方豪神父對中梵關鍵關係（1945-1952）轉折的貢獻〉）。（註3）先生認為，方豪教授雖未克移教香江，但透過與羅香林、牟潤孫等人的論學往還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史學界；而方豪教授來臺（1949）後，能相與切磋中西交通史之友朋轉少，遂開啟了研究臺灣史、宋史的契機，同時在徐誠斌的敦促下，得寫就《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》（1963-1973），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，添上重要的一筆；而方豪教授對發掘史料與保存史料皆極重視，大批留存的函札中，很多是與民初知名學人的翰墨往來，透過這些問學、論學的信札，將可重現民國知識分子互動的一個面向。

論及方豪教授對先生學術之路的最大影響，是開啟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門徑、傳授了治學要領（重史料及治近身之學）；（註4）此外，方教授以身作則的勤於著述、教研不倦，及對已發表作品的一再增補新史料，求其盡善，先生均深得其味。先生在臺大時致力臺大校史的研究，轉職輔大後，則著手天主教史的探研（如對香港徐誠斌主教的研究），此即對方豪教授「近身之學」的實踐，而先生對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著論，亦起步於對方豪教授學術生平的研究，亦算是近身

之學的融會與貫徹。

先生著論，一直秉持方豪教授「歷史專題研究法」（即「史料學派」）的範式，弘揚師道，謹守師教，不遺餘力。直至先生晚年，仍蒐印方豪教授主編的《上智編譯館館刊》（1946-1948），亟想進一步闡發方豪教授及該刊的歷史定位和貢獻，然未及發表；一直欲動筆的〈方豪的學術生涯：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〉，雖資料備賡，仍待完成，凡此皆有待於後人賡續。

臺灣史研究前輩楊雲萍教授曾譽方豪教授：「對於臺灣史史料的發見、研究和校刊，將與臺灣的河山同其不朽」。而先生對方豪教授的研究，同樣也禁得起學界的公評及時間的考驗。

先生曾多次講授「民國史家與史學」課程，對於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學術系譜甚為熟稔，對傅斯年、顧頡剛、夏鼐等學人，也都各有研究述及。除方豪研究外，先生晚年的力作〈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——從帝大到臺大（1928-1960）〉，（註5）則細縷講述帝大講座制如何過度到「史料學派」的陣營，從發軔、中輟、轉折到繁茂，該文剖析曲盡其妙，深得兩岸三地學界的重視。

### （三）關於臺大校史的相關研究

先生自1972年就讀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，此後即長留臺大求學、任教，對臺大校史長期投以關注，從發表〈傅孟真先生臺大七百日史料抄〉（1985），（註6）

到過世前的〈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〉(2010)，在臺大校史研究上窮究有功，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戰後三十年間臺大校史的若干問題，也為撰寫完整的臺大校史做了奠基工作。。

自1990年代起，臺大掀起修校史(如《Academia：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》，1996)、修系史(如《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：臺大歷史學系系史》，2002)的風潮，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，先生重拾校史研究，蓄力多年，再以〈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(1945-1950)：羅宗洛接收時期〉一文，(註7)顯現過人的史識與學養。先生深耕校史研究，除了是身為臺大人的自覺與義不容辭，至要的關鍵在於先生認為欲瞭解臺灣近現代學術史脈絡，首先須從臺大(帝大)校史入手。

先生在校史研究的時間斷限上，始自戰後臺北帝大的接收，而終於虞兆中校長任期。對期間幾任校長，包括羅宗洛、陸志鴻、莊長恭、傅斯年、錢思亮均有評述，其寫史以還原真相為要，不溢美、不矯飾，客觀陳述事實；惟每以諍語數言作結，以示寫史者的論斷，為來者鑑。

先生認為，接收前的臺北帝大，雖沒有為臺灣人廣開門戶，卻有著日本講座制學風的傳承，至少從文政學部史學科的資料看來，所聘學者、所做研究、所具視野，皆有可取處，而前來接收的羅宗洛校長，亦努力維繫臺大優良學風於不墜，接收過程更無可

挑剔，然而羅校長的抱負，抵不過行政長官公署的掣肘，在不願聽命即經費無著的壓力下，只好黯然去職；繼任的陸志鴻校長，雖挺過二二八事件中的處境艱難，最後則因辦學難令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滿意，遭到撤換；而接手的莊長恭校長，在任不及半年，因時局動盪、校務如麻，改革志業難遂行，在焦頭爛額的亂象中離任；由傅斯年校長臨危授命，在其整頓下，幾近停擺的校務重啟、校舍改建、課程改革、招生辦法等陸續上軌道，然而傅校長的驟逝，讓臺大的整頓魄力消散停格；後任的錢思亮校長，則一秉敬業守成的低調，讓臺大在穩定中緩步前進。先生的校史研究，是以歷任校長為時間縱軸，再鋪述以任內大事，層次分明、結構嚴謹，輔以校史檔案，及日記、函牘、報告書、回憶錄等各類史料，清楚還原戰後臺大各階段的發展和瓶頸。另外，先生極為重視口述回憶，也親自參與了對虞兆中校長的訪談；校史研究的對象，除歷任校長，亦旁及林茂生、杜聰明等至為關鍵的院長。

無疑的，先生極為欽仰臺大前校長羅宗洛、傅斯年之為人，認為他們是有守有為、有格的典範，是臺大自由精神傳承的憑藉，因而對兩位前校長的研究也倍下功夫。先生認為羅校長的去職，是臺大的損失，因為他是少數能調和校內日籍、本省籍、外省籍教授的推力，也是三方都敬服的人選，學術地位和學術眼光都夠，怎奈行政長官陳儀欲插手校務，羅校長不畏權勢，力爭無果，終掛



冠求去，卻已是做到所能做的；而傅斯年校長則為學術續命脈、傳薪火、存正氣，是臺大的精神指標，風骨長存，尤其在「四六學潮」發生後，對外勇於交涉保安司令部拘捕學生的作法，對內則苦口婆心的勸勉學生收心，用「貼布告」的方式即時傳達校方立場，和學生溝通。傅校長不止揭櫫大學教育的理想，更化為實際行動，汰劣擇優以提升師資陣容，貫徹意志期能弊絕風清，以不到兩年時間，為臺大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。

臺大校史研究的困難，在於校史館成立（2005）前，汗牛充棟的校史檔案，未能集中保管，編目、分類未盡善，先生耐心的從一件件校方檔案文書中，一磚一瓦的建構論述，披閱一卷卷公文、一份份會議紀錄，爬梳臺大歷任校長的抱負及作為，極費工夫（光是藏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《傅斯年檔案》，即有五千多件須借閱過目）。

綜觀先生在臺大校史研究上的最大貢獻，應在於發掘了戰後交接時期羅宗洛校長對臺大的擘畫與建樹，將先前幾被遺忘於歷史洪流中的羅校長，還原並肯定其歷史地位，為臺大再添新典範。此外，對於1949年前後的臺大，離亂承合背景下省籍衝突的研究，也是具有大時代意義的命題。（註8）

先生對校史研究的特色是有其首尾相銜的一貫性及預構的藍圖，先生曾擬就不少待作的課題（如南方人文研究所、東洋史學講座、《史學科研究年報》、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等），都因2007年離開臺大教職而未

暇著論，但至少他有著「遙引前路，以待來者」的先導之功。

### 三、結語

先生治學視野宏觀，敘事講求條理、邏輯清晰，因而能卓然成家，留下豐厚學術遺產，在三個研究領域，各自做出成績，也都自成體系：他為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擘建框架；他發掘方豪教授在治學之外的多面向貢獻；他在臺大校史研究上補齊了戰後動盪年代中湮滅的人與事。

先生擅長蒐集、利用周邊的一手材料，爬羅剔抉，解構成文，加之推論縝密，持論客觀，選題、剪裁皆獨具隻眼，因而作品極富開創性與學術價值，卻又不失其可讀性；先生的文筆流暢，用詞精審，既能寫通論性的長篇（如〈梯山航海——海外貿易的發展〉）（註9），也能寫就板板方正的專題研究。

先生一直是臺灣學界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中堅，尤其是上古到宋元這一段，先生離世後，幾成絕響；而在中國海洋發展史的教學與課程設計上，先生也是首開先例的倡導者（即與曹永和教授合開「中國海洋發展史」課程）。（註10）

「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」，儘管李東華教授的俗世名聲將隨時間而沈澱，遺留的學術業績及人格風範，卻可長留後人憑式。先生為文不草就，往往經長期醞釀、省

思，才有「十年磨一劍」的厚積薄發，惜天不假年，身後留下大批的札記與手稿，未能卒篇，學術生命戛然而止，寧無憾乎！

## 後記

本文作者為李東華教授生前指導的博士生，寫作期間感謝關玲玲師母提供相關資料，謹此致謝。本文限於篇幅，僅能概述李東華教授研究成果之一隅，其博洽深邃的治學成果，後世當有定評；其史學的特色與貢獻，則有待後人深掘。

### 【註釋】

1. 李東華，《方豪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1年）；李東華編，《方豪晚年論文輯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。
2. 載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第33期（2004年6月），頁261-313。
3. 收錄於《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，2002年），頁239-266。
4. 章群，〈方豪先生「六十自定稿」讀後感言〉，收錄於《方杰人院士蒙席哀思錄》（臺北：政治大學，1981年），頁193。
5. 收錄於李金強主編，《世變中的史學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147-171。
6. 載《臺大青年》，第91期（1985年），頁9-22。
7. 收錄於周樑楷編，《結網二編》（臺北：東大，2003年），頁455-493。
8. 李東華，〈光復初期(1945-50)的民族情感與省籍衝突：從臺灣大學的接收改制做觀察〉，載《臺大文史哲學報》，第65期（2006年12月），頁183-221。
9. 收錄於劉石吉主編，《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：民生的開拓》（臺北：聯經，1982年），頁453-524。
10. 〈臺大歷史系開課大破紀錄，一口氣增開十七門新課程〉，《民生報》，臺北，1984年10月12日，版9，文化新聞版。